

西方世界的兴起及启示

荣明杰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关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学术界有大量不同的观点。其中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为欧洲由于其自身发展出来的种种独特性,如:理性、制度、技术、环境等因素而崛起,进而创造了欧洲奇迹。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根据大量历史资料论证不应否定世界对西方兴起过程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用一种全球视角来看待欧洲的兴起。本文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看待西方世界兴起的视角进行综合文献回顾,由此得出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全球史观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3)12-0139-03

一 欧洲中心的视角

(一) 理性学说

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做讲座时整理出的《经济通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种建制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的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也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深刻些。但是理性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够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1]

这种由新教伦理发源而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而谋求经济上的成功,体现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特征。正是这种理性的精神直接影响了西欧城市的现代化,国家制度的规范化以及韦伯认为欧洲特有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出现。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解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甚至西方崛起的根本源头。

(二) 制度学说

诺斯和托马斯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形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系统阐释西方经济增长的开先河者。诺斯认为正是制度的合理性,激励个人不断进行可以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经济活动,而制度的不断发展、变化、创新则与历史不同时期人口的迁移与变化有关。诺斯进而考察了人口的变化对制度创新的影响。11和12世纪贸易和商业的不断恢复使市镇激增,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新市镇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行政和保护职能的政府,并形成一套法律来裁决新情况引起的争端。到了13世纪,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变得稀有,农产品价格上升,实际工资减少,最终导致了14、15世纪欧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饥荒、疾病的肆虐导致了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土地再次变得富裕,而劳动力则短缺不足,使得工人的谈判实力大大增强,地租的下降,庄园制主仆关系逐渐消失,租约延长,农奴开始获得对土地的专有权。16世纪因为船舶技术的发展,开启了大航海的序幕,新大陆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极大刺激了商业的扩张。股份公司等一系列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创立并

得以推广,随后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而市场经济的扩大引起民族国家的形成。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使最有效的军事单位的最优规模逐渐扩大。庄园为了效率必须扩大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并且为了维持国家的运转,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国家必须得到远远多于从传统的封建收入来源所能得到的财政收入。因此国家就必须鼓励、增加和扩大贸易。“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2]2}

(三) 技术学说

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中认为欧洲是在他的不间断的技术知识积累中突变的文化,因为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美国学者小林怀特的著作《中世纪技术和世界变革》表明了中世纪技术的发明创造是欧洲崛起的动因。他认为其中三项发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重型犁耕、马的项圈及马力的使用和三田轮体制。怀特认为由于采用了重型犁耕,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耕作制度转向开放的土地,正是这种耕作制度导向了人类合作,即群体模式的发明,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一种农民社会的再缔造,是庄园经济的实质。而怀特所说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二种发明是马的项圈。马的项圈改造了欧洲北部的农业和运输,使马代替牛来拉犁和车。由此,怀特认为农业生产有了巨大增长,商业活动得到加强,村庄变大了,使农村有了教堂、客栈、学校,逐渐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而第三种发明,三田轮体制相比较古老的二田轮体制使得休耕的土地由二分之一减少到三分之一,这样做可以更广泛的种植燕麦,使用马力。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有机会种植豆科植物,进而改善了欧洲的饮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怀特之后的学者提出新的技术决定欧洲兴起的观点,如杰克戈德斯通在他的书中写到,正是欧洲学会将从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理论,运用到技术革新中,并将技术革新与生产领域集合起来,才激发了生产力的增加,导向了欧洲的兴起。他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同时对比了中国、阿拉伯、欧洲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指出,前两者并没有在科学的发展上有任何落后,甚至对于世界科学的发展贡献远大于欧洲。但两者都没有将科学领域的理论与生产领域的应用结合起来,只有欧洲率先这么做了,因此,19世纪,是欧洲成为了最富裕的地区。

(四) 环境学说

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欧洲会崛起的原因正是因为欧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学家迈克尔曼认为,因为欧洲自身的地理位置,拥有充足的铁矿,因而欧洲的农民运用铁制犁耕田。约翰霍尔也同样称赞“欧洲北部的粘土”^{[3]3}西北部欧洲的“深厚而雨量充沛而肥沃的粘土,不需要进行灌溉”。埃里克琼斯在他的《欧洲奇迹》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森林土地和雨水农业无止境的生产环境”,欧洲的“充沛而均匀的雨量和好过的夏天”^[4]。还有一种经典

的“角和河湾”的环境理论。这个论点认为,欧洲的半岛和海湾的配置使得欧洲人拥有可供航行的河道,使这个大陆的交通、贸易和通达性具有了自然的基础,这些条件与市场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具有重要关系。还有观点认为与亚洲和非洲相比,欧洲发生的自然灾害远远小于二者,这也为欧洲得以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

二 全球视角

正如分析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说可以看到的,许多学者的视角是从欧洲内部的种种独特特质而引起了欧洲的兴起。近年来,以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用一种新的世界史的全面视角来重新解读西方的兴起。

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利用大量历史证据阐述了在至少18世纪前欧洲不仅没有超过亚洲,而且远远落后于亚洲的新论点。无论是农业产量、制造业水平还是贸易繁荣度,亚洲在18世纪以前,都是世界的中心。弗兰克认为,欧洲的兴起是建立在东方的衰落基础上的,“‘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5]4}原因是什么呢?在18世纪,欧洲人正在进行财富积累,技术革新的时候,亚洲却陷入了政治危机,忙于处理内部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落下了。弗兰克否认了欧洲的兴起是因为欧洲在中世纪时技术领先于亚洲的原因,相反,他认为欧洲的技术一直落后于亚洲。而技术的大爆炸式的革新发生在欧洲的原因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是全就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了这种变化。18世纪欧洲人处于世纪经济的竞赛与角逐中,主要与亚洲人竞争。因为亚洲许多地区人口——资源比例比人烟稀少的欧洲要高,因此工资低于欧洲。欧洲的高工资高成本,使得生产出的产品根本无法与亚洲产品竞争,因此刺激了节约人力的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由此,弗兰克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欧洲兴起的图:当亚洲开始衰落时,殖民地的资本流入欧洲,商业措施与殖民措施的结合,使得大量原棉流入欧洲,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木材木炭供应紧张,煤炭因为成本的下降,变得更经济,更实用。纺织业技术发明和蒸汽机的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将这些技术广泛转播利用,越来越懂成本,将依旧较高的劳动纳入“工厂体制”使生产迅速地增长;实际工资和收入下降了;“世界工厂”通过“自由贸易”征服了市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全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

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即通过一系列比较:首先是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以及市场经济因素,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奢侈品消费,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等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证明西欧在19世纪以前没有任何独一无二,反而还落后于亚洲。然后比较了东西经济发展中制约因素,如随着人口增长和工

业发展,对粮食、原料和木材等土地集约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耕作,出现了森林采伐过度、土壤肥力下降、洪涝灾害增多等现象。这是对工业发展最致命的生态制约。在17和18世纪,这个制约因素对西欧和东亚的困扰是同样的。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之中。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先进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而第二个支撑点是殖民地的开拓,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本书最后部分分析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弗兰克和彭慕兰都是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州学派挑战欧洲中心论,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并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而且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这个学派的出现为我们探讨西方的兴起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更加全面来思考这个古老却又常新的论点。

三 启示

无论是以欧洲中心为视角的理性学说、制度学说、技术学说、环境学说等,还是以—个全球经济为视角的加州学派都对西方的兴起这个命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阐释,但显而易见,这些理论观点都有或多或少的漏洞和不足,因此出现了诸多批判,在彼此的批判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个学说所存在的不完美,也正是这种批判,使得不断产生出新的观点,更多详实的历史证据,更加严密的逻辑分析,也为经济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命题的不断思索,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启示。

(一)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前提

不可否认对于发明创造的制度性保护,为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前提。这为当下中国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动力缺乏提供了破解思路,应该更加注重对于制度的建设,让制度促进技术的进步,进而为整个社会带来发展动力;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无疑是西方兴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反观当下中国,对于私有财产保护不足,划分不明,正严重阻碍经济的进步,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措施,成为必须之策。

(二)政府功能的转变为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创造了便利条件

这也为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了一条发展思路,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无论是受益于自由经济思潮而兴起的美国,还是建立了一套君主立宪制度的欧洲,政府在国家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指挥者、领导者,而是监督者、推动者。这也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大范围繁荣。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毫无疑问,必须针对本国国情,借鉴西方经验,谨慎做出逐步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让政府扮演好一个新的也是最合适的角色。

(三)全球视角为西方的兴起进行了准确定位

这就要求中国在崛起之路上要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国际贸易的掌控,国际关系的处理,都是当今复杂形势下中国崛起之路所必须重视的。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也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进来,走出去”的提出是中国的对策,不仅应该坚持,更应该进一步提高。同时,从西方兴起的过程中汲取精华,思考在相似时期西方国家的对策,对中国的崛起也是不无裨益的。从研究探讨300多年前西方的兴起之路,可以得到诸多对当今中国兴起的有益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是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斯韦伯. 经济通史[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 [2]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3] 道格拉斯诺斯,托马斯罗伯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4] Jones E. The European miracl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5] 杰克戈德斯通.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 - 1850)[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罗 渊)